

# 目 录

序.....	张爱萍 (1)
引言.....	(1)
第一章 青年岁月.....	(1)
童年的记忆.....	(1)
走出家门.....	(7)
最初的风雨洗礼.....	(10)
虎口脱险.....	(13)
第二章 光荣入党.....	(17)
庄严神圣的时刻.....	(17)
千里跋涉赴临沂.....	(18)
在人民革命大学里.....	(23)
接受新的使命.....	(26)
第三章 初上蓝天.....	(29)
跨进航校大门.....	(29)
圆了蓝天梦.....	(36)
速成改装.....	(41)
从“活塞式”到“喷气式”.....	(48)
第四章 长空较量.....	(56)

奉命北上.....	( 56 )
战前准备.....	( 63 )
初试锋芒.....	( 75 )
从5:0到6:1.....	( 87 )
首次空地协同作战.....	( 107 )
热血铸丰碑.....	( 112 )
执行二线作战任务.....	( 133 )
难忘的教训.....	( 141 )
辉煌的战绩.....	( 148 )
<b>第五章 南北征战.....</b>	<b>( 157 )</b>
飞向新的高度.....	( 157 )
展翼华东.....	( 162 )
东海之战.....	( 166 )
夜空歼敌.....	( 171 )
“技术爬坡”.....	( 181 )
镇守南天.....	( 188 )
<b>第六章 平地风波.....</b>	<b>( 202 )</b>
走上军的工作岗位.....	( 202 )
一封信引起的风波.....	( 204 )
意想不到的批判.....	( 211 )
从杭州到北京.....	( 214 )
“九一三”前后.....	( 223 )
<b>第七章 新的航程.....</b>	<b>( 236 )</b>
奔赴广州上任.....	( 236 )
放开胆子练精兵.....	( 239 )

始终拉紧战备弦.....	( 245 )
第八章 重担在肩 .....	( 250 )
任空军副司令员的年月.....	( 250 )
在空军司令员的岗位上.....	( 261 )
结束语.....	( 306 )
附录：	
一、对抗美援朝空战经验的回顾.....	( 310 )
二、空战中如何争取主动权问题.....	( 322 )
三、对歼击机战斗队形的探讨.....	( 326 )
四、适应现代战争要求 提高部队 技术战术水平.....	( 332 )
五、关于空战战术和战斗作风问题.....	( 337 )
后记 .....	( 350 )

# 第一章 青年岁月

## 童年的记忆

公元1926年1月19日（农历乙丑年十二月初六日），这是个清冷的冬日，海风阵阵，掀起汹涌的波涛。一个在娘胎里没有获得充分营养、可怜瘦弱的小生命，诞生在山东省烟台市一户贫苦的市民家庭里。这个家庭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不是欣喜，而是增添了几分忧愁。多少年后，父亲曾对我说，这就是我出生时的情景。

当时，我们家里人口很多，上有年迈的祖父祖母，下一个姐姐四个哥哥和我，还有叔叔婶婶及堂兄堂姐们，加在一起共有十四五口人。这么大的一个家庭，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的是从基督教会慈善机构租借来的几间破房，全靠父亲和叔叔二人在外谋职挣个小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再添丁增口，只能加重生活负担，怎能不叫人发愁呢？

听父亲说，我们家的原籍是山东省平度县第七区泊子村人。祖父是制作鞭炮的手艺人，由于他年轻力壮，手

艺出众，生意尚好，不仅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逐渐积攒了几个钱，置下了几亩沙土地。此时家庭人口不多，祖父祖母膝下只有我父亲和叔叔两个儿子。祖父很要强，虽然家境不富，也要供儿子上学读书，指望日后有个出头之日。父亲是长子，比叔叔大几岁，他在六七岁时，被送进私塾读书。教书的老先生为父亲起了王兰芝的学名。父亲自幼聪颖，学习勤奋，不仅书读得好，文章作得好，字也写得好，还练出了一手绝招——双管齐书，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才子。他十六七岁时考中了秀才，乡亲们闻讯纷纷登门祝贺，全家老少无不欢喜。

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祖父在制作鞭炮时，不幸发生了爆炸事故，崩坏了手指，造成了残疾。耍手艺的人崩坏了手，生意做不成了，光靠几亩薄地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苦做苦熬地在当地过了几年，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父亲和叔父经过商量，并征得祖父祖母的同意，忍痛卖掉了用血汗挣来的房子和土地，无可奈何地进城另谋生路。

我们家由平度乡下搬到了烟台市福音村。这里的居民都信奉基督教，故以“福音”为村名。后来由于城市建设的不断扩大，福音村已不复存在。前些年我回烟台时曾经找过，没有找到。我们家虽然住进了福音村，却摆脱不了厄运。乍到烟台时，父亲一时找不到谋生的职业，只好东借西凑弄到一点本钱，开个小食品店，靠卖油盐酱醋赚几个钱来养家糊口。后来又托人找到个警察的差事，在烟台市政府门口站岗执勤。1912年8月，孙

中山先生到烟台视察时，父亲还荣幸地执行过警卫任务，亲眼目睹过国父的尊容。父亲尽管有了这么个差事，但因位卑职低收入无几，家庭生活仍然没能摆脱困境。这时，有位与父亲相识的许振江先生，他是广东籍人，想去威海办一张小报，见我父亲有些才学，又写得一笔好字，很希望我父亲去威海和他一起办报。父亲正愁没有合适的职业，马上辞掉警察的差事，应邀去了威海。他们经过一番筹措，出版了一张小报，由于内容贴近市民生活，颇受大众喜爱，订户较多，效益不错，这给我们贫困的家庭带来了转机。可是，没过多久，报纸停刊了，父亲又成了无业者。至于报纸为什么停刊，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找不到当事人了，我始终弄不清楚。这以后，我们的家庭生活又陷入窘迫之中。就在这个时候，威海市成立专员公署，招聘雇员，父亲应试被录取，担任文书工作。不久，我们家就从烟台市搬到了威海市东门外温泉村。这是我6岁那年的事。

我们家自从由乡下搬到城里后，父亲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信奉起基督教来，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并为我们弟兄洗了礼。父亲经常去教堂做礼拜，有时还带着我们弟兄一块去，想让我们也和他一样皈依基督教。我们弟兄的表现很令他失望，总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眼睛转来转去看着周围的人口诵经文、顶礼膜拜的举动，心里觉得好玩好笑。想必是父亲注意到我们弟兄的顽皮表现，怕我们的行为不恭，后来就不带我们去教堂了。

父亲是个读书人，自然知道读书的重要。然而由于

家境贫穷，负担不起学费，六个子女，只有我勉强读到高中。我的姐姐取了个王秀英的学名，但是一天也没有上过学，是个文盲，长大后嫁到农村，成了农妇。大哥、二哥、三哥读了几年小学，就过早地出卖劳动力谋生去了。四哥没进过学校门，是父亲在家教他读书识字的。我是老五，年龄最小，得到哥哥们的照顾，才获得了上学读书的机会。

我们五个弟兄的名字都是父亲给取的，大哥永春，二哥永福，三哥永生，四哥永乐，我叫永昌。连在一起是春、福、生、乐、昌，从字义上看，那是很吉祥的，但在黑暗的旧社会里，吉祥之福并没有降落到我们的头上。

回想我当时上学的情景，不免让人心酸。有钱人家的孩子六、七岁就上学了，我长到八岁了，还没有进学校的门。看着和我年岁相仿的小朋友们，不少人都背着书包上学了，我急得眼泪围着眼眶转，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满面愁容的父亲，希望父亲能够点头答应让我去上学。

哥哥们看到我和父亲的样子，从旁劝道：

“爸爸，还是让永昌弟弟上学去吧！我们哥儿几个好好干，节省点，就把学费挤出来了。”

父亲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说道：

“那就上学去吧。咱们家里供你上学可不易，千万要好好读书啊！”

这时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

几天后，父亲为我办妥了入学的手续，我也和其他

小朋友一样背着书包上学了。哥哥和父亲谈话的情景，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成为鞭策我刻苦学习的动力。

我上的学校是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校名为海星小学。这所学校的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高，是当地的一所名声很好的小学。我所以能进这所学校，可能与我父亲是基督教徒有关。

在我上学之前，父亲曾经对我进行过一些启蒙教育，教我读过《百家姓》、《三字经》，认识不少字。我一上学就插入二年级，跳过了一年级。由于我有一定的家庭教育基础，加上我自己的刻苦努力，仅仅读了半年又跳到三年级。

我家里很穷，但是，对穷也要一分为二。穷，使人早熟，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我从小养成了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无论是做游戏还是做功课，我总想胜过别人，从不肯落人之后。我上小学连跳两级固然和家庭启蒙教育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我自己有上进心，学习勤奋。同学中不乏富家子弟，他们上学前入过幼儿园，上学后又聘有家庭教师，学习条件比我好得多，学习成绩自然也不错。我没有他们那种优越条件，但我不想落在他们之后。我不声不响暗下决心，上课用心听讲，下课抓紧时间复习，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一丝不苟地去完成，所有课程都学得扎扎实实，课堂回答、考试成绩比那些富家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小家里弟兄多，父母照顾不过来，我自学会走路起就自己照顾自己。家里连一件儿童玩具也没有，弟兄们除

了吃饭和睡觉外，经常在户外蹦蹦跳跳跑来跑去，有时玩“捉迷藏”，有时玩“老鹰捉小鸡”，有时扯起麻绳玩“跳绳”。离家不远就是西山坡，有时小朋友们还跑到山坡上去捉知了，捉蚂蚱。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锻炼身体，无意之中身体却得到了锻炼。我的个头不高，皮肤晒得黝黑，胳膊、腿结实而有力。上学后学校开运动会，我跑得最快，常拿第一。老师、同学都为我鼓掌喝彩。

我家虽然住在大海边，可我在上小学之初还是个“旱鸭子”，不会游泳。这倒不是因为我笨，或者不想游泳，而是母亲有个严格的禁令：“不准下海！”否则是定打不饶的。不准我下海，是怕我溺水淹死，我懂得母亲的意思。

可是，我却在无意之中学会了游泳。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几个小朋友沿着海堤向学校走去。当时正在涨大潮，海水已接近岸边，一个大涌上来溅得堤上满是海水，又光又滑。大家只顾说说笑笑，互相戏耍，我一脚踩滑，哧溜一下掉进大海，冷不防喝了好几口又苦又咸的海水。等到我露出水面时，已经离开岸边好几米远了。小朋友们焦急地呼喊：“王永昌！王永昌！”但谁也不会游泳，干着急没办法。我心里也很害怕，但是我想到，如不赶紧爬上岸就会淹死，便使出浑身的劲来，两脚用力上下扑腾，两手使劲向前划动，身子不由得就浮了起来，三下两下就爬上了岸。小朋友们高兴地围上来，都说我行。我学游泳就是这样开始的，可以说是无师自通吧。

这件事情对我很有启发，它使我认识到，困难和挫

折并不可怕，只要勇于拼搏，就能战胜它。在我日后的生涯中，我始终认这个理，碰到什么困难都不打退堂鼓。

## 走出家门

我在小学读书时，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和“以空间换时间”的政策，积极反共打内战，对日本侵略者步步妥协投降，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日本侵略军很快吞并了华北。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也踏进了我的家乡威海。侵略者野蛮成性，疯狂至极，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切齿痛恨。1937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主张抗日的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在陕西省临潼华清池以武力扣押了蒋介石，对其施行兵谏，迫使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国共两党的积极宣传和推动下，一个全民抗日的高潮在全国各地掀了起来。历史上深受倭寇之害的素有爱国抗倭传统的胶东人民，采取各种方式对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斗争中走过来的。

抗战初期，威海市各学校秘密地组织了一些抗日活动，如举行讲演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等。主张抗日的政府官员和军队中的军官以及社会上的爱国志士纷纷拉

起队伍，上山打游击。当时在威海附近有两支游击队一支是以威海市公安局局长郑维屏为首的游击队，简称“郑部”，在昆嵛山一带活动；另一支是以国民革命军海军第三舰队刘公岛基地第二教导队第六中队中队副安廷赓为首的游击队，简称“安部”，也称东海独立第七团。我四哥王永乐原在第二教导队第六中队当学兵，此时也成了游击队员。他们利用人熟、地熟、耳目多的有利条件，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摸哨兵，炸炮楼，劫军车，抢军火，搞得鬼子日夜不宁。

侵略者对占领区的统治越来越严密，对出入城的行人严格盘查，有时还要搜身，稍有疑问就扣起来，打骂行人是常事，尤其对妇女肆意进行污辱。我们上学时几乎天天都能耳闻目睹这类事件，肚子气得鼓鼓的，恨不能把侵略军抓过来千刀万剐，方解心头之恨！一天，我和詹学德、姜炳昆、李继召等几个同学谈起了所见所闻，越谈气越大，越谈越发恨。我说，我四哥王永乐已参加游击队，去打日本鬼子了，咱们也去找游击队吧。他们说，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基于对日本鬼子的强烈愤慨，我们离开了学校，背着家人，从自行车行里租了两辆自行车，两人骑一辆就上路了。由于走得匆忙，连块干粮都没带，一口气跑了大半天，肚子饿得咕咕叫。我们顺路找到詹学德的亲戚家，讨了顿饭吃，问明了路线，又继续赶路。

我们一行来到一个靠近山区的村庄，据说游击队就在这一带活动。也是我们运气好，在村头遇到一位认识

的老乡，他叫王鸿臣，是个游击队员，在和几位弟兄放哨警戒。他问我们到乡下来做什么，我们说，在城里受不了日本鬼子的气，要参加游击队打日本鬼子。他说，好，就在我们这里干吧！詹学德、姜炳昆、李继召，他们三个决定留下来。我说，我四哥也在游击队里，我决定去找他，哥儿俩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我和詹学德、姜炳昆、李继召三位同学分手后，只身来到我四哥所在的独立第七团第二营驻地牟平许家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家独自闯荡。这一年，我刚满十三岁。他们营长见我年纪小，是个小学生，长得挺机灵，不让我下连队，叫我给他当勤务兵。我满心不愿意，也没敢吭声，心想：我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来伺候人的，真倒楣！四哥倒是很愿意让我当勤务兵，想必是怕我年岁小，打仗有闪失。当时我没这样想，这是以后琢磨出来的。

我在游击队里干了一年多时间，做的是烧水、打饭、打扫屋子、为长官洗衣服等杂事，实在没有意思。再说，这支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开始还是抗日的，后来逐渐发生内讧，互相争权夺利，随着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总政策的实施，他们已经没有多少抗日的积极性了。加之它的成员很杂，有些是兵痞，有些是来混饭吃的烟鬼懒汉，纪律松弛，军容不整，看了让人生厌。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必是父亲了解到这种情况，担心我们年纪轻、没主意，被人带坏，毁了前程，托人捎信要我们回家。这也正和我们的心意。

但是，要离队回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请求离队是

绝对不准的，开小差回家被抓住要吃苦头。我们哥俩，还有想跟我们一起走的司号员梁振泽，经过仔细商量、周密计划，先到邻村孙家沟偷偷做了便衣，又到河东村大车店找到了愿意为我们领路的商人。随后，我们瞅准机会，乘人不备，离开驻地，脱掉军装，换上便衣，跟随商人一起于深夜抄小路逃了出来。我们就这样同这支游击队不告而别了。怕队伍派人追捕，我们先绕道跑到烟台，在叔叔王兰桂家躲了两天，后辗转回到威海。梁振泽是乡下人，他自己回乡了。

事后听说，我们三个人逃出来后，游击队曾派一个排追赶我们。他们到大车店询问我们的去向，大车店的伙计骗他们说由大路走了。他们信以为真，追了半天扑了空。幸亏没追上，如果被抓到了，不死也得脱层皮。

我的几位同学是否还在游击队里，或是到别的地方去了，以后的事情我就知道了。几十年后我才听说，詹学德在抗美援朝期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同美军作战中牺牲了。

这段经历，使我初步领悟到了人生道路的曲折与复杂。

## 最初的风雨洗礼

回到威海后，我继续上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我考入了威海市立初级中学，成为我们家唯一的中学生。

1943年，与威海卫隔海相望的刘公岛爆发了共产党

领导的武装起义，站在海边可以望见岛上弥漫的硝烟，听到激烈的枪声。威海卫城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鬼子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街上巡逻，汉奸特务到处窜。老百姓紧闭门户，商店关了门，学校停了课，街上空荡荡的，死一样的沉寂。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却更加隐蔽、活跃，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息。

在我们威海市立中学里，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秘密串联，发展抗日组织，与汉奸特务进行秘密斗争。我在学校是个活跃分子，爱好体育活动，400米、800米、1500米中长跑是我的强项，在学校多次囊括上述三项中长跑冠军，又是游泳的好手，还是校足球队队员，经常出头露面，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多是思想进步的正直青年。我因曾参加过抗日游击队，于是成了三青团反动组织和特务分子暗中监视的对象。起初，我自己并未察觉，有一天，我们中学附近的清泉小学的黄道源老师见到我，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学校里什么人都有，情况复杂，你要注意点，不要过多暴露自己。”说完，拍拍我的肩膀走开了。黄道源老师也是一位体育爱好者，我们虽未打过交道，但经常在运动场上见面，彼此都认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想念这位好心人。

1944年5月，我在学校经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李新民的介绍，参加了青年中队。青年中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当时活跃在胶东地区的抗日组织，中队上面还有大队。成员分布在解放区和敌占区。解放区的青年中队是

武装组织，经常神出鬼没袭击敌人，如炸碉堡，拔据点，破坏公路、桥梁等，消耗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敌占城镇地区的青年中队是秘密组织，主要任务是搜集、传递情报和散发传单等。参加青年中队后，我在学校的秘密接头人是戚合轩，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上面的接头人是戚国经。我和戚合轩都由他领导。戚国经的家在戚家庄，离城几里地。我经常把观察到的敌人的动静，如学校内三青团的活动，鬼子、警察的警戒部署，以及其他一些可疑情况，写成材料，送给戚国经。再从他那里把宣传抗日、宣传革命、揭露敌人的小报、传单和革命书籍带回来，秘密散发出去。最近我回烟台的时候，见到了我中学时的同班同学戚道茂，他小我两岁，离休前是烟台市房管局局长。在回忆往事时，他说，他还看过我们秘密传给他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籍。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把传单、小报拿回来后，趁黑夜四周无人，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有时是塞进商店的门缝里，或者扔到伪政权机关、伪官吏和财主家的深宅大院里……。我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给站在十字路口的人指明方向，以分化瓦解敌人，扩大抗日营垒。

我懂得这些活动的作用和意义，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一次次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心里始终有一种使命感和自豪感，觉得自己是一名爱国抗日的斗士，有一种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意志和勇气。

## 虎口脱险

1945年六七月间，抗日战争接近胜利。一天，戚国经把我叫到离城30里地的羊亭。当时戚国经正在那里活动。见面后，他对我说：“抗战即将胜利，敌人狗急跳墙，斗争更加尖锐、残酷，要时刻注意鬼子、汉奸的动向，掌握好敌人的情报，并且要保护好自己，以迎接新的任务。”戚国经的一席话，使我深感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关怀和期望，一种使命感和胜利在望的喜悦之情同时涌上心头，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坚定地说：“好，我记下了！”

抗日的烽火越烧越旺，鬼子汉奸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厉害。我每天留心观察敌人的各种迹象，把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情况一点不漏地记下来，送出去。

有一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此人貌不惊人，穿着朴素，寡言少语，满脸和气，一见面就让人喜欢。他叫崔崇昆，是通过我四哥的介绍，到伪警察所一分所当警察的。因为他不是城里人，在威海城里没有亲戚可投，四哥把他安排在我们家里搭伙吃饭。四哥有事抽不开身，是我把他接到家里来的。为了不给我家增加生活负担，他还带来500元伪币、50斤粮食。我以地下工作者的眼光，观察此人的一举一动，觉得他当警察并非是寻职谋生，而是另有所图。我四哥看出我的心思，把我叫到一边，神秘地伸出手来，展开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八”字。我

惊喜地小声说道：“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四哥谨慎地关照说：“此事你知我知，千万不可泄露出去。他是八路军的情报人员，为了摸清敌人的情况，做好消灭敌人、光复威海的准备工作，才冒险打入警察局的。”从此，我们家里有了同一个战壕里的三位战友，彼此心照不宣，关系十分亲密。

8月初的一天，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骑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辆破自行车，戴着苇子编的圆顶草帽，出城去送情报。不料，在威海西羊亭集上碰到了小学的同桌同学王某，他的弟弟也在集上，不知来这里做什么。我知道王某是个三青团员，思想反动，行动鬼祟，经常盯进步同学的梢，不干好事，不想和他接触，就把草帽往下一拉，装着没看见走过去。在我和他相距不太远时，我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那双贼溜溜的眼睛正盯着我。我一转身挤到人群里。为了防备万一，我没有直接到接头点找戚国经，而是往别的路上兜个圈子，再去和戚国经接头。

躲过了初一，没有躲过十五，在我下一次去接头点送情报时还是被特务盯上了。第二天上午，我赶海回来刚到家里，三个荷枪实弹的特务跟上门来。当时，威海地方不大，城内只有几万人，很多人彼此都认识。这几个家伙经常在街面上活动，我认识他们，一个叫许流子，一个叫小庆子，还有一个姓谷的。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王永昌。”我不慌不忙地回答，并反问他们：“你们找我干什么？”

“有些事找你谈谈，请跟我们走一趟。”